

中国社会学文选

READINGS
IN CHINESE SOCIOLOGY

应星 周飞舟 渠敬东 编

上
册

中国社会学文选

READINGS
IN CHINESE SOCIOLOGY
应星 周飞舟 渠敬东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作者简介

应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等。

周飞舟，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以利为利：财政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等。

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缺席和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及教育》、《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等。

目 录

导论·····	001
---------	-----

第一编 现代中国社会的形成

编前言·····	011
1.1 中国社会的传统品质·····	017
乡土中国·····	费孝通 017
宗法制度下的婚姻与家族·····	陶希圣 025
中国人的面子观·····	胡先缙 035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瞿同祖 050
1.2 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与出路·····	063
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 063
基层行政的僵化·····	费孝通 084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吴景超 091
1.3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098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 孙立平 王汉生 王思斌 林 彬 杨善华	098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孙立平 114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 渠敬东 周飞舟 应 星	152

第二编 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

编前言·····	183
2.1 农业改革·····	188





小城镇，大问题·····	费孝通	188
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	温铁军	209
村庄边界的多元化		
——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	折晓叶	217
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	张 静	230
低层政府干预下的软风险约束与“农村合作基金会”		
·····	刘世定	245
2.2 非国有企业改革·····		266
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		
——以乡镇企业为例·····	刘世定	266
产权怎样界定		
——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	折晓叶 陈婴婴	290
逃避、联合与表达：北京“浙江村”的故事·····	项 飙	325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		
·····	任 焰 潘 毅	351
2.3 国有企业改革·····		362
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	路 风	362
为什么内部市场机制会失败		
——对一个国有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	平 萍	391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沈 原	419

导 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始进行学术规范化的讨论以来，伴随着写作格式与注释体例的逐步规范，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细究起来，究竟什么才算是学术传统，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在不少人眼中，提起社会科学传统，常常想到的只是远隔重洋的西学传统。因此，传统的承袭似乎只意味着与国际接轨。以社会学这样一门西方的舶来品而言，认真汲取西学精髓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问题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汲取西学的营养？西学与我们自己的传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变局，要求我们必须对现代处境中的中国人的人心安排和社会建制做出深入的考察。为此，那些在民国时期曾尽心从事中国社会研究并推进中国社会改良或改造的老一辈学者留下的思想遗产，就理应成为我们担负上述学术使命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自严复将“群学”的概念引入现代中国以来，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们就始终以中国社会结构的宏大变迁为挑战和契机。他们通古晓今、学兼中西，目的就是要将那些构成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的重要部分探明究竟，以中国自身为基本问题，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实质上奠定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者学术立身和立言的根本。因此，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这些思想传统，与理论研讨和实地调查一样，是重新奠定中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必备工作。

除此之外，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 30 多年了，我们身边的这些学人和作品也可以被纳入传统的范畴吗？严格地说，传统是需要时间的冲刷和筛选的。而中国当代社会学由于底子薄、根基浅、时间短，即使是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成果，离人们所熟悉的大师经典，也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然而，中国当代社会学如果妄自菲薄，只是一味地嫁接、拼凑、移植和复制西方的成品，那么她就始终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也就没有能力发现和深化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建立和强化自身的学术传统，才可能真正深入地汲取西学的营养。这种营养不仅限于西方社会学的资源，还包括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研





究的各种学科,以及哲学和历史的研究。这个新的学术传统,虽然刚刚处于起步状态,但是既有对民国以来学术思想的传承,又受到西方学术方法的浸润,正在逐步呈现出与中国现实相呼应的中国社会学的特征。本文选就是呈现中国社会学新传统的一种尝试。

社会转型与学科定位

193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经为社会学究竟应该“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应该“学以致用”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年轻的费孝通坚持“学以致用”的方向并身体力行(费孝通,2002)。40多年后,当费孝通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领头人时,社会学就开始紧贴着时代的脉搏而重生。因而,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转型就成为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主轴。

就中国社会转型对学科的影响而言,我们认为大体经历了四波。第一波是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十年动乱的惨痛经历、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使人们追思历史、诉求人本、呼唤新启蒙,在此背景下,人文学科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科。第二波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经济改革成为推动社会全面改革的杠杆,在此背景下,经济学自然成为整个社会科学中最耀眼的学科。第三波是从全面市场化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暴露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而所谓“好的市场经济”,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法治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0),法治被视为走向健康、公平的市场经济的导引,法学也因此成为学科的新宠。而第四波则是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发展与断裂的悖论、繁荣与失衡的困境,已经无法仅仅冀望法治能解决这些难题。正是社会转型尤其是中央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为社会学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一方面使社会学家可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广泛地参与到社会转型中,进行政策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派提供了最具“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2005)的机会空间。

今天的社会学开始不再自甘于作为一种剩余学科,只满足于在经济学家们的市场、政治学家的政府和法学家的法律之外去寻找自己的一块领地。这种做法的后果只能是遗失对社会总体问题的关怀和承担。实际上,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变迁来说,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间的差别并不是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差别,而是视角、思路、着眼的逻辑有所不同。其中的道理也许在目前学科的细分中不容易看到,但如果我们回到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回到社会学面临着现代危机的那个经典阶段,就会看得很清晰、很透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中国社会学必须回到西方经典时期的总体问题上去的理由。其实,经典社会学三大传统的兴起,无不应对的是社会总体结构的问题,始终坚持着总



体的社会科学方向。这与中国目前的境况很相似，所有细微的现象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牵扯出总体性的结构问题。19 世纪，不管是马克思、涂尔干还是韦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绕出国家和市场、工厂和企业之外，去专门发明一套与这些实质问题关联甚微的所谓“社会”的学问，相反，摆在眼前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可他们处理这些现象的角度和方法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不再满足于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而是从商品中看到了市场、企业和国家的本质，乃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物化本质；涂尔干也始终坚持用社会的道德神圣性意涵来统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群体和国家；韦伯则从人心、社会和经济诸领域中看到了理性化的逻辑。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尽管还非常稚嫩，但她已经逐渐意识到，仅仅固守住所谓“社会”的阵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国家和市场的核心区域，努力到市场中去看不到的东西，到政府中去看不到的东西，到法律中去看不到的东西。社会学的想象力成了社会转型和社会重建时代的思想利器。由此，我们不仅要从社会内部思考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而且要把它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行业的重新调整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不仅要考虑社会制度的公平性，而且要考虑社会制度背后的基础秩序；不仅要考虑社会组织重建，而且要考虑在社会组织中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的铸造；不仅要考虑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如何建构真正属于中国社会及中华文明的理想社会图景的问题。

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并举

中国社会学研究经过 30 年的积累，所形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的齐头并进。

社会结构分析是社会学独特的学科视角。结构分析强调的是分析的总体性，它把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社会总体结构的基本特性上去考虑，强调结构模式、制度安排和社会规范对人的行动的引导与约束作用，即一个社会的每个生产生活的片段，都应回归到社会总体结构的基本特性上去。结构分析的总体性更强调构成结构的每个环节的特性，即着力去寻找总体结构的每个位点的分布及其相关特征，尤其是对影响总体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若干重要环节。以就业为例，我们不仅要对供求关系的总量做分析，还要将分析贯彻到构成上述供求结构的每个位点上去。今天，如果从全国范围内人才的供求总量去分析的话，恐怕仍然是供小于求，但如果我们将分析落在结构的每个位点上，就会发现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从原来的民工潮转为今天的学生潮，即知识型人才供求失衡的局面，大量人才积压，甚至很多人才转向做蓝领工人，还有一定数量的人才面临着失业危险。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人才短缺的情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因此，就业问题凸显出来的结构问题并不是人才供求总量的



问题，而是地区差异和制度安排问题；同时，如果将就业问题落在每个位点上，我们会发现不同位点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竟呈现出相反的态势。再比如医疗改革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讨论医疗如何市场化，最后会发现所有的大病小恙都涌入大医院，而地方医院或社区医院则很少有人来看病了。因此，若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来看医疗改革，就不能只依靠市场化的逻辑，还需要从社会安排的总体布局上来重新给医疗机构定位，此外，我们还需要从人们日常的消费心理结构出发来细致地考察患者的就医心理，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引入社会学的视角来作分析。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发展最早、成果也很丰富的几个领域，如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分析、现代化研究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城乡二元结构分析，都属于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

社会机制分析则特别能体现出中国社会学独特的洞察力。所谓机制，简单地说，是目标与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项。对社会制度作机制分析，就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分析社会制度的运作机制有什么意义呢？制度设计和结构模式尽管对社会行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社会行动的复杂性在于它常常偏离制度设计的方向。因为行动者采取社会行动时的复杂性和偶变性，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遭遇不同的情境时所可能发生的变化，既不完全都是制度能够意料到的，也不是都能体现在最后的结果中，只有在对事件动态的考察中，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无论是分析社会制度的历史起源，分析社会制度的规则秩序，还是关注它最后的客观后果，都既不足以展现社会的微妙之处，也无以凸显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社会制度框架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事件及其牵涉到的各种复杂而抽象的社会关系作为分析的焦点，国内有学者称其为“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孙立平，2005）。

社会制度与社会机制、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本来是构成社会学分析的两个最基本要素，缺一不可。但这两者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一个高度稳定、已然成型的社会来说，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分析入手就足可以理解其大概。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矛盾频出、冲突激烈的社会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种在政体连续性、精英连续性、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的背景下进行的巨大转型来说，结构或制度分析常常难以理解这个社会存在的种种“潜规则”、变通行为、非正式运作及各种微妙的现象。机制分析在此就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使中国社会学能够更好地面对社会实践中的问题，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社会事实看做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就此而言，机制分析恰是社会学家用来把握一个社会变迁的动因及其发展可能性的有效方法。中国社会学界将包含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分析统合在一起的实践社会学广泛运用在城乡、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当然，社会结构分析和社会机制分析各有长短（在这二者背后还隐含着在

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对立，此处不赘述)。社会结构分析长于把握总体，短于把握社会事实上的丰满感、历史感，一些论述容易陷入空疏，有些经验研究迷信数据和方法，甚至炮制脱离常识感、曲意迎合的数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斥之为蛊惑人心的“社会巫术”(Bourdieu, 1999)。机制分析长于把握生动的社会事实和微妙的社会运作，但容易产生一个缺点是分析细碎化，拘泥于局部事实，而无法回到总体问题上去。因此，这两种分析视角需要取长补短，相互结合，从过程来看结构，透过制度显机制，才能获得对社会的恰切理解。但目前这两者之间深入的对话和自觉的结合还非常不够。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四个问题

我们在为中国社会学取得的这些成就而欣慰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目前还存在着若干相当突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概念与方法的简单移植。中国社会的重建最初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的的大力支持，中国留学海外、成名海外或回国任教的社会学人绝大多数受教于美国，加上美国社会学一直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支撑着它在世界社会学领域的某种霸权地位，因此，美国社会学对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今后这种影响还会不断增长。不可否认，社会学本就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即使是在努力本土化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包括美国社会学在内的西方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断滋养。然而，由于美国在世界的强势地位、美国对科学与方法的强调常常使相当一些人对其理论和方法缺乏反思，因而对社会学的中国化难以产生贴切的理解，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简单移植到国内来。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则喜欢贩卖欧洲后现代思潮中一些令人眩晕的新名词，对一些浮泛而时髦的文化研究亦步亦趋。

第二个问题是朴素经验主义的盛行。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当年在探索社会学中国化道路时不满足于用西方问卷填中国资料的做法，也不满足于用中国史料来注释西方理论的做法，而是另辟蹊径，借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改造社会学。这一方向在费孝通后来带队重建中国社会学时重新得到了重视和强调(费孝通，2000)。这种方向使中国社会学一开始就贴近现实，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不过，也有相当一些人误以为进入田野可以不受理论传统的熏染，以为经验直觉可以无须与任何理论传统辩驳、融汇就可以直接上升为新的理论。因此，他们本能地拒绝西方理论，希望直接面向田野，创造出自己的一套概念名词甚至理论体系。诚然，目前重要的社会理论绝大部分是西方人提出来的，那些第一流的西方思想家也少有了了解中国社会的。但是，这绝不等于诸如韦伯、涂尔干、福柯、布迪厄、吉登斯这样的西方思想大家与中国社会学是无关的。西方理论既不是拿来给朴素的经验作学术八股式包装的，也不是用来剪裁现实、切割生活的，而是让我们通过触摸学术大家的博怀与锐识来培养我们自己





把握问题的洞察力的。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没有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祇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社会学家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这正是取决于他们的理论修养。简单排斥西方理论，与对西方理论零敲碎打的运用或将西方某些概念硬套在中国研究中是同样危险的做法（应星，2005）。只有依靠理论素养和经验直觉的相互滋养，依靠本土社会学传统与西学资源的相互滋养，我们才可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社会学的创新之路。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学的政策倾向压倒了学术建设倾向。社会学本身尽管有着很强的实践性格，但毕竟与实务性、操作性极强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哪怕是在国势危如累卵之时仍满怀着经世济民、救民于水火之志，然而，作为韦伯意义上“以学术为业”的社会学家，他们的心志绝非出于入庙堂、受命于课题、陶醉于献策，而是更强调学术传统的打造、理论思维的训练、专业人才的培养所发挥的长效作用。费孝通（1994）时常强调的“学以致用”，是说社会学不能闭门造车，不能无视中国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并无让社会学全然成为社会政策学之意。他晚年倒是一再强调“开风气、育人才”的重要性，强调“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实际上，我们只有巩固了社会学自身的学科传统，才可能去谈社会学的学科担当问题；只有立足社会机理的深入研究，才可能派生出良言妙策。而现在许多实证研究是低层次的重复研究，总是被一些资金充足却缺乏深度甚至问题虚置的课题牵着鼻子走。如果缺乏自己独立的、从容的、深入的思考，“课题学术”的虚假繁荣很可能会摧毁社会学这个本来学术根基就很不牢固的学科。比如，在目前论者云集的农民工研究中，就堆砌了大量低层次的课题研究成果，正如一位评论者敏锐指出的，目前的农民工研究急需完成两个转变：一个是从研究“抽象工人”转换到研究“具体工人”——即提供各种工人的具体形象、具体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以及描绘他们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另一个是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问题上，研究生产过程对塑造农民工的决定性作用。只有通过这两个转变，才能把农民工研究纳入社会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宏大框架中去，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考察劳资关系，考察权力的支配与对权力的反抗（沈原，2006）。

第四個问题是重视生态研究而无视心态研究。社会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也与人文学科有着紧密的关联。费孝通（2003）在晚年常常呼吁社会学理应具有广阔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文化自觉，不要过于科学化。他强调要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使社会学的研究从生态（人文生态）秩序扩展到人能够“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去研究人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研究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人际关系，研究各种具体情境中的自我意识，研究将心比心的韵味。费孝通这个说法启发着我们去思考社会转型中最深层次的问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转型遭遇的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

社会公平失衡的问题，也有人说是社会失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社会底线失守的问题。这些说法当然各有道理，但似乎都还未完全点透。我们可以回到涂尔干那里。涂尔干把他那个时代最根本的病症归于集体意识的衰落，归于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他毕生所思就是如何为民族道德复兴贡献科学的方法，或者说，如何把社会学建成真正以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道德科学。就中国的社会现状而言，在公平和秩序问题背后实际上有着更根本的因素——社会价值和心态的问题；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制度所嵌入其中的社会基础秩序的缺失，更体现在整体的社会精神危机上。涂尔干给我们的启示是：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人文学者的专利，社会学不仅可以而且应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致力于社会价值的重建。梁漱溟半个世纪前所提出的“新礼俗”的讲法、潘光旦所强调的“中和位育”的追求、费孝通晚年所强调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理应成为中国社会学努力超越西方厘定的文明格局，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传统文明提升到全新境界的路标。然而，社会学界甚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更乏扎实的研究了。

几点说明

本文选所选入的文章大多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那些有洞察力的发展路向，而较为自觉地去克服上述四方面的问题。当然，诚如前言，这些文章也许或多或少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然而，社会学界的问题似乎恰恰在于缺乏严肃的商榷，常常是自说自话、互不理睬。因此，即使是那些敏锐地抓住了中国社会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也由于缺乏真正的批评、对话而难以深入。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养成尊重今人的习惯，严肃地看待本土学者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追思，否则，就永远也无法积累成果并逐次推进，无法找到构筑学科传统、打造中国学派的起点，而只能始终漂浮在无根的状态中。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民国社会学研究成果；二是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三是海外中国研究，尤其是一些用双语（英文和中文）写作的海外华人学者的正在对国内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在本文选中，民国部分仅选了很小一部分，这是因为李培林、渠敬东和杨雅彬（2009）已经编选了一部非常系统的《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因此，本文选的重点就放在当代部分。海外中国研究传统是一个有着较强的传承性的学术传统，本文选因为篇幅有限，对这部分内容就不拟收录了。边燕杰（2002，2008）先后编了两部关于社会分层研究的文选。尽管社会分层研究仅仅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从中领略海外中国研究的风采。

本文选分为四编。第一编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形成”，前两节主要展示民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传统及其现代转型的分析路向，后一节则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总体性分析。第二编为“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



这部分主要是对 30 多年经济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是社会学努力面对经济改革这个总体性问题与经济学家潜在对话的成果。第三编为“政治治理与社会结构”。这部分主要是对政治治理的目标、机制、渊源及后果的社会学分析。第四编为“社会生活与社会阶层”。这部分是最具“社会”本身特色的分析。如此一来,在历史的脉络下,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复杂关联就构成了今天的社会学者眼中的中国社会。关于每编的具体编选方式和脉络,还会在各编的编前言中交代。

本文选是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教材的教辅读本。其主体内容曾经在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选讲过。感谢本文选诸多作者和《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授权我们选用这些文章,感谢方慧容在编选结构和第二编编前言中提供的实质性帮助以及在“中国社会”课程上的认真合作,感谢李猛、杨清媚等人在导论和编选篇目上提出的建议,感谢何南宁在文稿输入和校对上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感谢白中林、毕向阳在资料查找、校对和电脑技术上提供的多方帮助。

参考文献

- ◎ 边燕杰主编.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 边燕杰, 吴晓刚, 李路路主编. 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 Bourdieu P,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London: Polity Press, 1999
- ◎ 费孝通.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1994 (1)
- ◎ 费孝通.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1)
- ◎ 费孝通. 师承·补课·治学.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北京大学学报, 2003 (3)
- ◎ 李培林, 渠敬东, 杨雅彬. 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 ◎ 钱颖一. 市场与法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0 (3)
- ◎ 沈原.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社会学研究, 2006 (2)
- ◎ 孙立平.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 应星. 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 社会学研究, 2005 (1)
- ◎ 应星.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 新华文摘, 2008 (24)

第 一 编 |

现代中国社会的形成

- 1.1 中国社会的传统品质
- 1.2 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与出路
- 1.3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编前言

中国的社会学始终是伴着中国社会辗转曲折的现代历程而生的。中国社会近现代的几次重大变革既孕育了社会学的独特品质，社会学也以其独特的方式而融入了社会激变的大潮之中。中国社会学在发育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上识国体、下察国情的基本精神，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客观认识，更是在每个阶段里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提出了总体构想。因而，中国社会学的发轫真正促发了现代学术的兴起，也真正培育了中国学者立国化民的社会关怀和学术使命。

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发端于清末西学东渐和维新变法之时，也是中国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领域主动融入现代化进程之时。初如康有为、梁启超所持的“合群立会”的群学主张，后如严复“以群学为纲……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的思想，都为中国社会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晚清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应维新之亟，率先提出“合群立会”之说，其所提倡的“群学”，乃为“组织教育群众之学，拯救中国于危亡之学”（韩明谟，1986）。中国社会求变之终因在于“国不能群，乃因官僚不可群议政事；士不能群，乃因学者不敢相聚讲求；商不能群，乃因商人不能同业谋利”。因而，若开国政、工商和学术之新风气，图国家民众之富强，依靠民权和绅权去专制政治之固弊，借“合群立会”之策，推行政治公议和民间公学和以政党奠定政制，以学会开启民智，乃为确立中国现代民治政体的双重根本。

严复，是系统奠定“群”之范畴的第一人。他最先从人格、群体、国家之多重维度构建了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的总体构想。严复的“群学”，首先旨在回归民本思想，即若强国保种，必得从民身与国体入手（严复，1986：17）；中国之现代改革，不仅必从经武、理财、择交、善邻等方面治标，更必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方面治本；国力之复苏，应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三项基本变法入手（严复，1986：65）。在严复看来，强民力、树民德的根本机制，已不可单纯诉诸传统意义上的伦理纲常，而必须植入现代的要素，必须





在广大国民中构建“群”的范畴。严复通过译介《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以及《法意》等著作，旨在强调必须通过培育社会有机体，通过培育作为“群”的集体义务，方能将民力释放出来，即将宗法制度基础下的社会结构改造成“群”策“群”力意义上的公益结构：“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严复，1986：981-982）因此，民本乃为“群”本，乃为民德（mores）之本，然民本亦必合“天下”之本，合社会进化的根本逻辑。

因而，严复译《天演论》，与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样，是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出发，力图从中国重新进入世界的现代进程入手，重建普遍意义上的天下观，将中国“自强保种”的“世变之亟”，逐级纳入进化秩序的结构之中；从历史目的出发来确立社会建设的普遍规律和政治理想，提出“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严复，1986：1347）。由此，群学在三个层面上所奠定的社会范畴得以展开：力本之基础为民本，民本之基础为人本，本身必自本心，群学自求身（物）之学起，以求心之学为宗旨；归民本，必合群，民力的解放应纳入社会组织的途径上，即通过合群、结社、立会，增强公益与公意；人之成长，群之建设，应循天理秩序，循演化秩序，人类进步不忤逆自然，应与自然的演进与发育合一，此乃人类的最终伦理目的。

可以说，中国群学之初兴，奠定了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宏大格局，并率引着中国此后百年思潮的生发和流变，其后各种学术和政治观念之端脉，皆由此并起。大体说来，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中学释西学，具体表现在严复的“群学”思想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思想是如何激活汉语的古老语汇，而汉语的丰富内含又是如何改造西方概念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西学发明中学，具体表现在“社会学”是如何作为刘师培、章太炎等晚清新国学派用以拯救国学的利器的。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科学的学科形式的本土化时期，具体表现为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各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逐渐从以教会大学为主扩展至国立大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外籍教授逐渐为本土学者所取代，在教学和研究上逐渐将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与本土材料结合起来。第四个阶段是社会学学科实质的本土化，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力图以社会学“中国化”为宗旨提出中国社会自身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同时也通过实施大量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调查与实验，积累了各种丰富的实地研究资料（姚纯安，2006）。

本编前两节所选文献，大体分布于1949年前社会学发展的三四期。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学界曾掀起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演化的大论战，此论战的核心议题乃是中国在自成一体的文明共同体格局遭遇世界挑战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复杂境遇；与此同时，这种境遇客观上也要求中